

西西的「我從火車上下來」是以第一身寫一位剛從國內回港的年青人，當他看見別人的洒脫而自比時，觸起一陣酸溜溜的感覺：「我豈不和他們同樣年輕，我豈不懂得兩手空空飄然上路最寫意」，由此而鋪寫出主角在大陸數日內的經歷及與阿田的關係。他從香港與大陸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得出一個觀感：香港人對國家的感情、關係和心態就僅存一點無可奈何而已！

如果這是一篇小說，那麼它的故事就是發展自兩個不同的時間空間。開始是火車站、現在的、主角平日居住的香港；然後通過主角的回憶或自白（來得更恰當），倒敘他數天前在一個陌生無名城市的際遇，接着是回到現在的空間，讓主角重申他的無奈。小說的另一個要點衝突，筆者則認為那是來自作者與讀者的交感，小說本身並沒有營造出一個有力的衝突，作者只不過藉着思維的組合來替主角「解釋」，他這一篇侃侃而談的獨白好像是要向讀者說明自己下火車時的笨拙，純粹是因為阿田那一張誠懇、帶點怯意又充滿溫暖的臉，「因為這臉的緣故，我又點了頭」，作者越替主角申辯，讀者越覺香港這一代年青人可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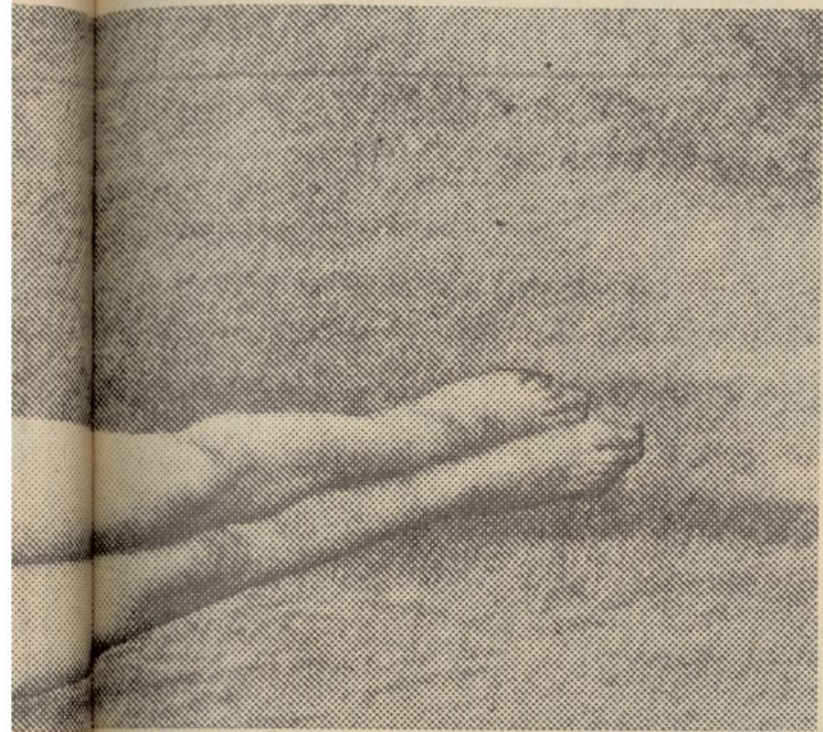
作者的動機是寫出香港年青人對祖國的

感情，主角的動機則是解釋自己為什麼不懂得享受兩手空空飄然上路的寫意。讓我們看看作者如何把兩者串連起來而令讀者在輕鬆的氣氛及筆調中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首先全文的題目「我從火車上下來」漫不經心的帶出一種不太特別的交通工具——火車，因此我們完全接受那「手裏握着一大把狗尾草的女孩」、「握着香枝的母親」、「握着風車的小孩」、「一些年輕人，背着背囊，露出燒烤叉子的長柄」，和那個「幾乎花了二十分鐘，才從火車上下來」的主角，讀者開始對主角產生好奇。「並不是因為我剛才一連喝了七瓶汽水的緣故」，這裏我們看出作者有意無意的把讀者的注意力轉往主角走在最後的原因上。原來是因為那些可惡的木魚。隨着主角因木魚的回憶，我們走進另一個時空，「街道都是我不熟悉的，也不曉得它們叫什麼名字」，「這是一個我全然陌生的城市」，「我朝公園繞了老半天還沒有找到門口」，這裏難道是祖國？那裏找不到豆漿攤子，快餐店，當然談不上什麼漢堡飽、雪糕梳打、雜果賓治，甚至是飛機模型，砌圖遊戲也沒有。但是我們見到「對面的一列牆正在舉行書法展覽」，「來買餅的人都提着一個小罇，並且排成一列長長的隊伍」，「到了車站，口袋的錢都要拿出來換糖」。那裏還有描花鏤空的檀香扇子，莫名其妙的石

頭，刀刻的木魚……夠了，夠了，這不就是我們的祖國嗎？那火車豈非詩人筆下的臍帶嗎？主角這數天來不就是在大陸嗎？在他的祖國呀？為什麼他回來時會為避開那些嘲笑的眼光，而「打開了腦袋朝裏面找尋」，無聊得「從爛泥水一直聯想到天堂的雲朵上面去」，還計劃着找朋友出來大叫大嚷，他不是應該有很多感觸嗎？

小說發展到這裏我們只覺得大陸與主角好像是兩條平衡錢，他們的關係到底在那裏呢？就在阿田，他是「我母親朋友的親戚的兄弟」，雖然「經過傳達再傳達」，我們終於都可以找到「他」。小說的主線仍是主角解釋他之所以變成「一座樹林」就是拜這位阿田所賜。這一節好像是寫主角與阿田的一段真摯友誼。讓我們看看這份「友誼」的基礎吧。主角除了把母親托他帶的餅乾、蛋卷和烏墨墨的布外，「我把我的後備鞋，羊毛外套，T恤，雨衣，電筒，都給了他。我選把足上的鞋換了他的膠拖鞋，如果我能夠，我願意把腕上的錶同樣留下來」，「如果阿田要我拾一扇門回來，我立刻就會去拾」。這一點義不容辭的熱誠實在是難得的；而阿田被主角的「一個膠袋裡還是三斤荔枝，另外的膠袋裡是四個蘿菠」，「帶我去看過長頸鹿，又帶我去看黑熊」，「帶給我兩個線袋，一個袋裏是菜乾和髮菜，另外的一個袋

本地柑



裡，則是一隻大號的砂鍋」，雖然主角不大願意拿這些東西，他看見那四個菠蘿就好像連吃了四個波餅，但是阿田的臉是那麼誠懇，帶點怯意，充滿溫暖，他一次又一次的點了頭。沒錯，他們兩個都很真誠，但這份不是友誼，而是同胞微妙感情的投射吧了；這份同胞的感情源於大自然，源於同一母系，「阿田」這名字不正予人鄉土的親切嗎？無法依靠物質交換而建築起來！

阿田與主角實在有太多不同了，他們雖然是生長在同一個時間，但卻長在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文化深候，「他的頭髮比我短，穿的褲子也比我短」，「阿田喜歡吃飯，我喜歡吃大蝦沙律」，「阿田會種田，我是連塘蒿和野草也分不清的」，主角過着物質豐富且便利的生活，而阿田，他的同胞，連吃麵粉餅也得排起一列長長的隊伍，穿的只是膠拖鞋，他們那短暫的「友誼」，刹那的真摯，完全是因為他們還有一點相同，就是「也是黑頭髮黑眼睛」，他們同是中國人，雖然關係已經非常疏遠，卻總也源自母體（母親朋友的親戚的兄弟）。

從現實來看，阿田對主角的款待可能基於地主之誼，和一點物慾；而主角亦意識到自己在物質上是充裕者，故發自人類的同情心，他一次又一次的照顧那些貧乏者。感性點說，可能他們都意識到大家是同胞，故此

阿田的熱誠的招待，令主角醒覺到自己的優越而產生一種歉疚，那種近乎罪惡感乃驅使他們在可能範圍內作出種種補償，從而他主觀地更欣賞阿田的誠懇，且還答應好好地把這一切帶回家去，於是，當他下火車時，「我的模樣如一頭刺蝟」，「像極了一桿橫放着的衣裳竹」，「那蓬鬆的植物，使我移動起來如一座樹林」，我們試比較平時的他，「難道說，我要去買一把描花鏤空的檀香扇子？阿耳一定要笑到耳朵都綠了吧」，但這一次他毫不介懷。為什麼筆者會認為這是罪惡感作祟呢？因為筆者不願意把這種情緒稱之為民族感，就如如不願見到一點點的民族感情被渲染誇張成一種令人吃不消的激情一樣。我所看到的主角是多麼冷靜、客觀地拒絕喜歡這個城市，並不因為「祖國」而有了感性上的偏好，一方面「這是一個我全然陌生的城市」，另一方面「因為我不熟悉這個城市，所以我沒有找到豆漿」、「沒有找到快餐店」，買麵粉餅要排隊「而排隊是我最害怕的事」，「糖是我不喜歡的」，主角就是憑着感官接近「他的祖國」，當他回到香港時，他有一種莫名的興奮，因為他可以回復「正常的生活」了，他計劃着要不要立刻去找那群老朋友出來一起大嚷一頓，他幻想着「和大伙兒坐在一起喝着咖啡」。雖然他是中國人，但他與祖國的關係就是如此疏離，

正如前面說過他與阿田（大陸的中國人）雖然是生在同一個時間，但不同的空間，不同的文化氣候，他對國家缺乏了一種實際生活經驗的連繫，即使是片面的歸屬感也沒有，因為這一代「沒有鈕扣沒有拉鍊」，「好像一袋一袋的米一般的少年」實在太年輕了，他們對祖國沒有半點兒根，偶然的情緒可以激勵他們作出有限度的犧牲，帶給他們一些驚喜，我結果找到了五花茶，我喝了三杯五花茶；有時卻是一種尷尬，「我的模樣如一頭刺蝟」；或是一陣感官的痛苦，「我把木魚從椅子底下檢回來時有兩次撞痛了頭」，但完全沒有半點兒生活的憑藉和支持，因為他們的內心根本沒有祖國，沒有民族。

作者就在這不知不覺間諷刺（自嘲？）香港及大陸的中國人，以一種輕鬆的筆調，配合著樸實的寫法，將主角的思想及心態赤裸裸的呈現讀者眼前——就民族而言，一個無根而架空了的海外中國人，欠缺足夠的認知和生活基礎，回鄉亦終究是浮泛的感官接觸吧了。香港的年青人就好像一袋一袋米似的，中國的年青人則好像沒有生命的白木魚，香港人回國時，每每情緒起伏，甚至有些還帶着無限且無由的激動，但他們都好像主角帶來的白木魚，「大半變了黑木頭木魚」，許多時，就「是這樣子的，我從火車上下來。」